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亨通

第五期

本期要目

- 专题研究 ·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与都市化 周大鸣
- 方法与方法论 ·
 关于分离指数的计算方法 马 戎
- 书评 ·
 认知、态度与行为 郭建如
- 调查报告选载 ·
 安图县教育发展状况（节选） 于长江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主 办

1996年11月

【专题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与都市化

周大鸣

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亦有相当大的规模，和分布在广大的区域。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五个自治区及云、贵、青等 8 省区中。据 1988 年统计，民族地区的 8 省、自治区共有 72 个市，其中地级市 19 个、县级市 53 个，平均每个省区 9 个市；镇 1059 个，平均每省区 132 个。城镇人口 5827 万人，占 8 省区总人口的 37.8%。如果按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算，民族地区都市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往的都市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汉族地区，而对民族地区的研究不多。自我国都市人类学会成立以后，开始多的学人关注这一课题。本文是对一些民族地区考察后的感想，从中可以见到民族地区的都市化过程与汉族地区有不同的模式。下面分类述之。

一、边疆城市的都市化～瑞丽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全国一盘棋的说法，而沿边开放和沿海开放就是一盘棋中的“两个眼”，“眼”做成了，整盘棋也就活了。1980 年代以来，在我国沿边开放了许多口岸。口岸的开放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推进了口岸地区的都市化。笔者对云南瑞丽的考察，可说明这一点。

瑞丽市是以傣族为主体的地方，人口 10 余万，除傣族以外就是傣族和汉族，实行三语制（傣、汉、傣语），最流行的是傣语和汉语。但一般人都讲双语，陪同我们访问的司机是傣族，汉语讲得很好，而另一位干部是汉族，也可用傣语交流。据说随着边贸开放，汉语越来越流行。我

们到了几个村子，村民们都能讲汉语（当地方言）。瑞丽面积仅 800 平方公里，但有 300 多里长的国界线，与缅甸是一江之隔，有些混合区是“一个村子两个国家”。两国的边民许多都有亲戚关系，所以来往比较多。过去缅甸生活比这边好，这边跑过去的人很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知识青年都跑到了对面居住。实行了开放改革政策后，宗教信仰也恢复了。傣族人信奉佛教，过去每个男子都要出家一段时间。“文革”中毁了很多庙宇，大和尚们都跑到边界对面去了。现在村村开始建寺庙（当地叫臧房），有的一个村有 2~3 个寺庙。庙里除了主持的大佛爷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大小和尚，除了学习经典以外，每天还要从事耕种等劳动。由于村民生活水平提高，俸献给寺庙的财物亦多，新的寺庙越建越高大，装修也越来越豪华。庙内都有电视机、音响、录相机、冰箱，大和尚的生活想来不错。

傣族大都住在坝子上，瑞丽的坝子面积约有 300 多平方公里，周围是山，傣族居山上，汉人住城里。瑞丽独特的热带植物和宗教建筑、别致的民居，加上傣族人能歌善舞，构成了瑞丽最重要的资源～旅游资源。边界开放以后，每天的国内外游客非常多，尤其是泼水节前后或夏天，每一家旅馆都爆满。从昆明到瑞丽的公路，由于车太多，正在扩建；每天有四班飞机从昆明到芒口市（德宏傣族傣族自治州首府），飞机是波音 737 小型客机，每班机约 180 位乘客，所有的座位都由旅行社包了，我们这类散客要购买机票非常困难。从芒口到瑞丽约 90 公里，需要 3 小时。但正在修高等级的公路，修好以后一个多小

时就可到。瑞丽也正在修直升飞机场与芒口机场联结。旅行团的游客不少是讲广州话的，其中一个团是来自广东佛山。

边界开放以后，建立了两个通商口岸，在姐告建立了一条“中缅街”。瑞丽的口号是把瑞丽建成第二个“深圳”，中缅街建成第二个“沙头角”。缅甸政府也很配合，将边界城市立为特区，在中缅街已建成了缅甸式的建筑一条街，许多商店已经开业，已正在修铁路，把铁路延伸到边界，这样边界与首都仰光连接起来。原来缅甸边界遍地是穿军服的士兵，使游客畏之却步。现在已把军队后撤几十公里，只有很少的边防军了。现在只要办一个特别通行证就可以经过边检到缅甸的边城去旅游。边民们可以随便来往。我们没有办证，仅补交 5 元人民币就通过了。离边检站仅 1.5 公里，乘三轮车就进入边城。正遇上边城赶集，人来人往，除了穿着不同以外，没什么区别。货物都是中国货。“健力宝”、“强力”啤酒都有，另外最多的就是服装和金银首饰。一些店主可以讲汉语，用人民币畅行无阻，一元可兑换 8~10 缅币，店主也特别欢迎人民币。边城另有几个旅游点，都是寺庙，规模比较大，边贸开放，给缅甸边民带来很多实惠。许多院落里都停了各种小汽车，都是销往中国。汽车上都有人民币价码，一辆丰田皇冠是 45 万元，日产车是 42 万元，而且标明包上牌照。中缅街这面，中国现在建了一长条临时房子，全部都是出售各种旅游品的商店。但一条比缅甸规模要大几倍的街正在建设中。宽敞的道路已修好，通瑞丽的桥也修好，两边的洼地正在填平，路两旁正在建起一座座的商业楼。目前来看，游客都是来自中国这一方，而缅甸一方还没有。但缅甸中央政府很支持，除了拨款建设以外，还破例允许中方的施工车入境装泥土填方。

瑞丽，主要是靠优惠政策，吸引了内地各省市以及香港商人来投资。投资的重

点是第三产业，包括宾馆、酒楼、交通、能源等方面。目前，以广东的投资最大，其次为四川。大量的投资者和经商者，加上大量的旅游者，因而瑞丽成了一座特别繁忙的城市。整个城市像一个工地，到处都在施工，建商业楼、工厂、道路等。服务业发展最快，旅馆、餐馆最多，一条长一里路的商业街，从早到深夜都挤满了人群，商品种类很齐，从金银首饰、日用百货到电器产品，有许多舶来品，如洋酒、香水、化妆品等。各种交通工具亦很多，三轮车、的士、中巴，还有各类旅行车。

这里不仅有许多外省民工，也有许多“外国民工”来打工。初分一下有两类，一类是经商的，卖金银首饰、玉器和兑换货币；一类是做工的，以从事建筑工为主。这些人主要来自缅甸和巴基斯坦（与本地人相比，肤色很黑，脸型也不同，服饰不同，一眼就可分辨出来），这些人的工价是月薪 150~300 元。

瑞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一般人的工资在 500 元以上。姑娘们穿着打扮很艳丽。消费指数上涨也快。那些餐饮、旅店服务业的价格比起广州不相上下（同样品质来比较），比昆明要贵。由于收入增加，一般人家条件也改善，电视机已很普及，私人有摩托车和汽车的家庭已不少，电视可以收看香港卫视节目。

瑞丽的起步是通过边贸开放和旅游业。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其它有许多热带的水果，如柠檬、香蕉、芒果。稻米的质量非常好，价格也较高。傣族的妇女很能干，既可下田耕种，亦会制绣、操持家务和经商。邻近的猛卯镇有两个办事处，每个办事处有四个村。东边办事处已与瑞丽相连。土地用来发展商品房和其它城市建设，大部分的劳动力都从事服务业和运输业，多余的房间可出租或办旅馆，生活比城里人还好，西边的办事处，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还从事农业，其他人则到城市经商或服务业、或运输业。农业以蔬菜种植

为主，兼种水稻。这个镇，五年以前还以农业为主，而现在农业则成为副业了，乡村都市化的进程很快。村民们的新楼是砖建的，但风格还保持傣楼的形式，建筑四面都有窗，楼下作客厅和厨房，楼上睡觉，上楼就要脱鞋，席地而坐，家中都有佛龕用于崇拜，在佛龕旁边摆架电视机。原来旧的竹楼，有的用来饲养牛和猪，或其它家禽，傣人非常讲卫生，村里、屋内都很清洁。村里也新建了寺庙，另一座亦快完工，说明宗教生活的重要性。

二、内陆少数民族地区的都市化～ 峨山

峨山在玉溪南约 50 公里，平均海拔约 1200 米，汽车行走一个半小时可到县城。峨山总人口约 10 余万，总面积约 1800 平方公里，以彝族为主，其次为哈尼族和汉族、回族。由于是自治县，不用上缴税利，国家每年有一定的财政拨款。县里有两个镇，一个是县城，一个是小街镇。县城建设得很规整，商店很多。一到晚上，城里很热闹，电影院、录相室和商店都营业，在街头上也有卡拉 OK，说是刚刚兴起的，所以没有多少人唱，看的人多。最热闹的是饮食街，一直营业到深夜 1~2 点。县城是昆明通往西双版纳和其它地方的必经之路，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多，主要是货车。县城里也以旅店和餐馆为主，有个新建的集市，也有许多经营山货的贸易公司。各政府机关也开始经商，差不多每一个局都设有公司。县城的企业并不多，主要是政府机关和服务行业及学校。县城的邮局、书店相当大，另设有民族中学。县城内政府的干部喜欢打领带、穿西服，即使不穿西服也打领带。其他人的穿着与昆明差别不太大。那些进城来的乡下人，男子喜欢戴军帽，女子则还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大部分人都讲汉语（昆明语），但更多的是讲彝语。本地人告诉我们，峨山最穷的

是汉族和哈尼族，而最富裕的是回族，地位最高的是彝族。县里从上到下各级机关一把手都是彝族，回族人善于经商，哈尼族居住在最偏远的山上，而汉人呢，历史上曾经是彝族的奴隶，现在国家的优惠政策只照顾少数民族，而不包括汉族。峨山过去非常穷，1979 年以后，随着商贸业的大发展，开始富裕起来。

我们主要调查了峨山小街镇的文明办事处和高平乡。文明办事处管两个回族村，办事处是 1991 年才成立的。村里回族占绝大多数，总人口约 1400 多，有两个清真寺分属于不同的教派，90%的回民是什叶派，清真寺规模很大，还有学阿拉伯语的学校，是 1985 年重修的。另一个清真寺是刚刚完工不久，据说这个教派只有十几户人家，可是合资兴建了清真寺。这个寺占地不大，寺里殿堂的规模仅略小于另一个清真寺，而且建筑更为考究，门窗全部为铝合金和茶色玻璃混凝土建筑。村里人估计建设费起码要 50 万。仅此就可想这个村之富足。村内大部分的建筑是两层楼房，并都有院墙，建筑风格和装饰是伊斯兰式的。回族人爱干净，院落内都打扫得很干净。每家的住宅面积很大，通常都是大家庭住在一起。通常女人都不出外工作，仅操持家务，而男人们则大部分时间在外从事商贸活动。这个办事处的主要经济就是运输业和贸易。回族人有着经商的传统，这个村的男人 1949 年以前许多都是在马帮搞贩运。从云南昆明到缅甸、泰国贩运各种货物。所以 1978 年开始，许多人又重操旧业，进行长途贩运，和跑运输。回族人既齐心也大胆，什么生意都敢作，资金积累很快。有了资金以后就购买拖拉机、卡车专门跑运输。现在 70%的家庭有汽车，有的家庭有两三部，成立了“文明车队”。峨山县的运输几乎被他们垄断了。也有开中巴和的士的，在一些院落内停有小汽车，据说都是私人的。一部汽车一年就可以赚回上万元人民币。这个村在 78 年以前还是

农业村，现在已经很少人种田，把田都让给邻近的一个汉人村耕种，或者村里其他人耕种。这样在 1991 年全部划入城镇，成了文明街道办事处。这个村电视机已经普及，但村里没有其它娱乐场所。这主要是伊斯兰教的限制。宗教是居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男人们只要在家都会去寺里朝拜（只有男人可以进寺）听人念经。家中都有古兰经，挂历都是按伊斯兰教出版的。村中也每年有人去麦加（沙特）朝圣，朝圣的费用都要自理。但由于有名额的限制，想去者都要排队等候。

走进邻近的汉人村，你会觉得进了另一个世界。村民的房子全部是土筑的或土砖砌的，土砖房子比较新，说明是新盖的。村里没有水泥路，也比较脏乱。在村北面是新区，都是用土砖盖的两层楼房。这个村过去是农业村专种水稻，现在开始种烤烟才逐渐发展起来。烟种子和技术都是有玉溪卷烟厂提供，也由该厂包收购，但种烤烟需要经验，烟叶收回来以后，烧烤烟叶更需要技术。因为烟叶的等级越高、价格越高。我们访问了司机的舅舅家，他是位成功的烟农，他种的烟长势比周围都要好。因此盖起了新房，他原来是农业技术学校毕业的。而村里大部分人种烟都不大成功，因为该村传统的种烟方法与此不同，又不愿意接受新的技术。一斤烤烟质量高可达 8 元多，而质量低没单位愿意收购，只有自己抽。一亩地产量高的可收 200~300 斤。

高平乡在县城的西南约 30 公里，是 1985 年新成立的一个乡，是由其它两个乡各割几村而合成的。按乡书记的话说，别人不要的村都扔给了他。这个乡是全县海拔最高的，有几个村的高度在 1800~2000 米。总人口 3000 多，辖五个村。乡的行政楼就在公路不远处，围绕着中心已有一所中心小学、卫生院、一两家小食店和杂货店。乡书记说，他计划把行政楼前面一块地全部填平，沿着公路发展一条商业街。

现在乡的工业主要是采石和采矿。农业过去单靠种苞谷（玉米），现在是多种经营，乡办了茶场，是他组织开垦出来的，已经种上了茶树，现在已经部分可采茶了。由于这里海拔高，过去不能种烤烟，现在发明新品种可以在 1200~1400 的坡地上种植，因此各村都在大力推广种烟，已成了乡的主要财源。去年，1992 年烟草业上交给乡的钱就有 20 多万，以此购买了一部上海产的桑塔纳小汽车，因此很珍惜，只是到县城、玉溪市才用，用完以后都要洗，然后用防雨布盖起来。下村都是开吉普车，山路难行，从乡政府到最偏远的哈尼族村要花 3 个多小时。

深果村辖三个自然村，两个是彝族村，一个是哈尼村。哈尼村距离最远，村落依山而建，全部是土筑，屋顶是平的可以作为晒谷物的地方，有 300 多人，室内走进又黑又小，但都有阁楼，阁楼是睡觉的地方。这个村没有任何工业，在山冲里有 100 来亩地，种苞谷和稻子，在山坡上也有些砍倒烧光的耕地种苞谷，但产量很低。村里小孩很多，但大多穿又脏又破的衣服。养的猪就在村道上行走。在山冲里有一块平地是小学校，也立有一个篮球架，村里有电视卫星天线，村里仅有的两部电视是政府发的。正值产蘑菇的季节，村民们都上山去采蘑菇。有一个小伙子骑着摩托车从县城来村里收购蘑菇，收购的山货全部装在手扶拖拉机车厢里。有些村民觉得小伙子出价太低，要赶到县里出售，据说爬山路到县城只要三个小时就够了，而且比汽车、拖拉机还快。

总果村在哈尼村的另一个方向，距离乡政府约两小时，海拔约 2000 米，汽车在山背上行走起伏并不太大。总果村比较大，从外表看村容也比较好，一条水泥大道横贯村中，村中有太阳能的浴室和卫星收视天线，有电视的家庭亦多些。村中有不少人在县城工作，还有一批人去深圳民俗村工作。房屋虽然仍是传统彝人式的，但建

筑材料有变化，各家用水管把山泉引进院里，成了自来水。虽说是夏天，由于下雨，堂屋中生火了以御寒。家庭的食物中有糖包子（这是汉人的食品），10点钟才吃早餐，仍保持着两餐制的习惯。主人解释说，因为彝寨的田地离住地较远，都在山脚或山坡上，劳动都是早出晚归，就只吃两餐了。这个村的主要经济就是种烟草，其余是苞谷，农闲时就出去打猎，所以家家都有几支猎枪。村里人的穿着比哈尼村人好多了。下雨天有人打着各种花伞，也有穿传统棕衣的。据说大部村民都会讲汉语，是个汉化程度较高的寨子。

三、藏区的都市化～堆龙德庆

西藏，地广人稀，经济生活独特，都市化的程度相对较低。其聚落的发展与寺庙、和行政中心的设立相关。目前仅有的两个城市，拉萨和日喀则，长久以来就是宗教和政治的中心。自改革开放以来，西藏自治区的发展战略之一就是走小城镇发展的道路。但小城镇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外援，是一种“注入式”的都市化。能否通过自身的发展走向都市化之路呢？从堆龙德庆县的发展可以获得这方面的启示。

堆龙德庆县位于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西郊，其县城距市中心仅14公里。全县绝大部分处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区、拉萨河南拐弯处及其支流堆龙藏布两岸。县境西北连接藏北草原，东南与藏南河谷构成一体。最高海拔5500米，最低海拔3640米，高差约1360米。堆龙德庆，藏语义为“上部极乐”之意，这里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松赞干布时，即成为吐蕃王朝社会经济开创地区之一，成为逻些（拉萨，吐蕃之都）的“粮仓”。后来，堆龙德庆一直以农业种植为主，兼有一定的畜牧业。1992年，全县面积约2600多平方公里，下辖12个乡镇，90个行政村。全县总人口6500户，33581人；其中农业人口有6128

户、31181人，分别占总户数、总人口的94.28%、92.29%；其中藏族占总人数的90%左右，其他民族几乎都集中在县城。

据统计，目前堆龙德庆县共有乡镇企业28家，从经营范围看，包罗万象，既有水泥厂、矿泉水有限公司、综合福利服务公司，又有哈达厂、粉条厂、糌粑加工厂等；从乡镇企业资金来源看，除县、乡投资和群众个人集资外，还走出县门、区门，展开横向联合，充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金，如东嘎联营水泥厂，是由东嘎镇与甘肃省乡镇企业局经济开发公司共同投资筹建的。羊达矿泉水有限公司是由县经济开发公司、羊达乡、西藏自治区地热地质大队、西藏自治区地热开发公司合资兴建，几家投资比例为43：19：33；5。东嘎综合福利服务公司，则是由拉萨市民政局投资11万元建立的福利企业；从规模看，堆龙德庆既有投资几百万元、用工几百人的大企业，又有投资几万元或几千元、用工几人的小企业。总之，堆县乡镇企业的崛起和迅速发展，对改变农村生产结构起了重要的作用。

多种经营的兴起，给堆龙德庆县农村经济带来的变化更大。该县多种经营重点是以拉萨为依托，因地制宜，发展各种行业，主要项目有运输、加工、采集、包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据堆龙德庆县政府统计，到1993年9月止，全县多种经营从业人员已达4291人，占全县农业劳动力的25%。全县农民拥有汽车329辆（其中出租车有34辆），大中型拖拉机159台，手扶拖拉机610台，主要集中在东嘎镇、羊达乡、乃琼乡和加热乡这些距拉萨较近的乡镇。仅东嘎一镇就拥有汽车103台，夏冲村几乎平均每户都有一辆拖拉机（包括手扶拖拉机）或汽车。汽车、拖拉机不但及时把农民的农副产品运出去，把农用生产资料和日用商品运进来，而且农民用它们为附近国家厂矿或一些乡镇企业跑运输，甚至去格尔木、樟木口岸拉货物。一

些农民则买了大小客车，从事客运，既跑拉萨，又跑曲水、泽当、日喀则等地，既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又方便了群众的交通，加强了城乡联系。现在从拉萨到堆龙德庆，人们随时可以赶上农民的“招手停”，只需1元人民币和几十分钟的时间。

与此同时，堆龙德庆县农村劳动力构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农牧民不再仅仅从事农业、牧业，还从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文教卫生业等。

在各行业中，农牧业劳动力逐年减少，从1984年到1992年，农牧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例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相反，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员几乎都在不断地增加，特别是交通运输、邮电业劳动力和外出劳动力，他们在总劳动力中所占比重分别从1984年的2.49%和4.54%上升到1992年的5.6%和8.39%；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劳动力增长速度也较快，1984年只有139人，到1992年增加到218人；从表中可见，工业劳动力不但占比重小，而且还在大幅度下降。在80年代中期，堆龙德庆县与内地联营建立起来各种县办、乡办、村办、工厂和加工厂，由于管理不善及资源的缺乏，都纷纷倒闭，所存无几；1992年建筑业劳动力比1988年有所减少，这是由于80年代后期拉萨大规模的“四十三项工程”造成那时农村建筑业劳动力猛增所致，但从总的趋势来说，建筑业劳动力仍在不断增加。

外出的劳动力，增长速度最快。堆龙德庆县各乡外出劳动力实际人数远远大于统计数字，特别是对于那些交通方便、靠近城市的乡村，在农闲季节，几乎50~60%的人外出做工，其中去拉萨打工的占90%以上，5%的劳动力流向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距拉萨只需乘坐几个小时的汽车），其余的则流向樟木、亚东、格尔木和内地等，还有为数不多的人去了尼泊尔、印度。乡村外出人员既有跑运输、搞建筑的，又

有做买卖、当木匠、画匠、石匠、制青稞酒、打杂工的等等，他们是农村中一支不可忽视、逐渐壮大的劳动力队伍。

经济结构的改变，劳动力的分化，使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

1、食。由于与城市联系增多，受城市和农村周围厂矿“城里人”“都市饮食”习惯的影响，其饮食方式也逐渐复杂、多样化起来。一是主食结构有所改变，副食品种更加丰富多彩。过去藏区农村以糌粑为主食，但现在农民越来越喜欢面条、米饭，在靠近城市的一些乡村，如堆县的乃琼、柳梧等乡，面粉、大米成为主食，糌粑反倒成为偶尔品尝的食品。副食种类越来越多，农民过去极少吃的蔬菜、水果已频频出现在其餐桌上。当然，农民在副食品上的开支也越来越大。二是农民外出就餐现象越来越多。据农调队调查统计，1985年堆龙德庆县农民在外饮食开支人均2.62元，到1992年，其开支已增加到人均8.17元，增长了3倍多。三是农民消费食品中，购买食品增多。堆县农民从1985年到1992年，除牛羊肉一项外，其余所有食品无论在重量上，或是在现金支出上都大有增加。购买食品量增长，这首先说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已具有了一定的购买力；其次说明我国藏区农村社会分工更加明确，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彻底打破，农村与城市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最后，市场经济的繁荣也为这种现象提供了条件。在乡村，既有星罗棋布的小卖部，又有零散的农贸市场。

2、穿。过去藏区农村大部分地方是靠自己捻毛织布，农闲时，请人到家里去做氍毹藏装。现在的农村，特别是靠近城市城市的乡村，已很难见到穿藏装的年轻人，藏装仅成为老人或年节时人们的一种装饰。年轻妇女在藏历初一穿过藏装后还会感到腰痛，她们已不习惯了长裙重坠的沉甸。人们甚至已形成了一种观念：穿藏装“土气”。如果走亲戚或进城穿藏装，

会使他们感到害羞。乡村着装的样式在变化，乡村人对着装面料的选择、制作方法等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人们已很少使用氍毹，即使做藏装，也宁愿去商店购买棉、化纤、呢绒、丝绸等布料，而且不再请人到家中缝做衣服，而是将布料送进各种裁缝铺。更值得注意的是，藏区农民越来越喜欢购买成衣制品。

3、住。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居住条件也在不断改善。从80年代以来，农民纷纷修建新房，到1990年前，堆龙德庆县已有70%的农户搬入了新房。建筑的房屋，一改过去的简陋，修建得雕梁画柱、富丽堂皇，而且在用料上，引进了现代建筑材料，如钢筋、水泥等，使乡村农居无论从外观、还是内部结构都与城市居民住宅相差无几。另外，在生活设施上，农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卫生讲究的厕所，代替了随地大小便的现象，燃料从牛羊粪、草料逐步向木柴、太阳能、电等过渡，甚至液化燃料已出现在个别农户家中。经常外出的农民，当然不会忘记将自己在城里见到的新鲜玩意买上几件回家，所以许多农民家庭陈设日新月异。

4、用。据自治区农调队对堆龙德庆县农民家庭用品的抽样调查，1992年农民人均用品消费比1985年增长了147.85%，而且用品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娱用品和书报杂志费用越来越高。农民家庭拥有现代化家电及用品越来越多。在80年代初，堆县大多数农民从未见过电视机，一些偏远地区的乡民甚至不知电视为何物，而现在拥有电视机的农民家庭已为数不少，特别是那些靠近拉萨的乡村，如柳梧乡夏冲村的农民，有70%的家庭已购买了彩色电视机。黑白电视机正逐步被淘汰。一些传统用具也被改进了的现代用品替代，如电动搅拌机出现在一些农户家中，代替了千百年来藏民族打制酥油必不可少的用具——酥油桶。

各种用品的现代化和更新，无疑会直

接影响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

5、休闲娱乐活动。过去村民们干完农活家务后，常爱集中在一起唱歌跳舞，喝青科酒，或者打藏牌、掷塞子等，不过那时农村的娱乐方式较单调。现在文化娱乐方式已日渐丰富多彩。有看电视、录相、听录音机的；有打台球的、玩电子游戏机的；有唱卡拉OK的、进舞厅跳交际舞的；有坐甜茶馆、打麻将的……城市居民的所有娱乐方式几乎都已在农村出现。

随着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牧民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表现：一是农牧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和平解放前，文化知识属领主和僧侣阶层的特权，解放后，党和政府在藏区推行义务教育和扫盲教育，使农牧民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教育对多数农牧民来说，缺乏主动性，属强行灌输型。而现在农牧民逐步认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农村教育的态度由被动转为主动。他们主动接受扫盲教育，1993年堆龙德庆全县扫盲人数达5000多人；积极参加各种技术培训班，如农业技术培训班、蔬菜技术和养猪技术短训班；学语言，成为目前藏区农牧民们的一种新潮流。一位三四十岁的村民曾告诉我们，“过去不懂汉语，与内地老板做生意多多地吃亏了”。当然，他们不仅学汉语，还有学英语、印第语的。

当今的农牧民不仅注重自身文化知识的补习，而且相当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在改革开放初，刚实行土地、牲畜归户时，大多数农村家庭更宁愿将学龄儿童留家里照看更小的孩子或放牧牲畜，尽管那时学校实行义务教育，老师还采取“读一天书发给学生一天补助”来吸引孩子读书的办法，但入学率仍很低。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现代化的生产、生活使农牧民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后，他们不但积极主动送孩子上学，而且还尽可能地为孩子选择好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如乃琼乡一些“万

元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邻近厂矿子弟学校就读，甚至花高价送去拉萨学习。而且在国家教育经费紧缺时，农牧民们便自己捐款或出力修建、维修孩子们的校园，为他们购买新的教学设备等。据统计 1988 年到 1990 年，堆龙德庆县依靠群众为改建 26 所民办小学集资和投工献料共折合人民币达 26 万元，同期国家补贴仅 7 万元。

2、婚姻、生育观的变化。六七十年代，由于城乡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农村姑娘们在选择对象时，梦寐以求的是能嫁给一位吃“皇粮”有“铁饭碗”的国家干部，期冀有朝一日能“跃龙（农）门”，农转非，成为“城里人”。当然，极少出门的农村姑娘要找一位城里人是不容易的，所以那些从农村参军入伍的军人们便倍受姑娘们的青睐，因为只要他们提干升级，转业后就会有一份好工作，成为非农业人口。但到 80 年代，由于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人的择偶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城里人的吸引力在逐步减弱，而农村那些兴农、养猪“专业户”、经商能人等成为人们择偶的优先对象，“有钱哪里找不到媳妇”似乎也成为农村小伙子们勤劳致富的动力。

3、宗教信仰上的变化。刚改革开放时，农村出现了“宗教热”，农牧民一有空闲就上寺庙或去转经、煨桑，为了参加一些宗教活动甚至会放下手里的农活，家庭收入除留下家人一年生活必需外全部捐献给寺院，如有人生病、去世或结婚，都得请喇嘛念经、打卦。近年来，藏区农村的宗教信仰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尽管随着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增加，家庭平均宗教开支不减从前，甚至超过过去，但同时更多的资金却用于家庭扩大再生产；婚礼、葬礼上，同样会延请喇嘛念经，而且排场、阵式超过以往，但这似乎已成为家家户户赛富的一种象征，一种习惯性的作法，宗教虔诚在逐渐减退；有人生疮害病，首先会被送往医院，如不能治愈，再去寺院请

喇嘛打卦念经。

4、大众传播的普及和信息交流的加强。与外界联系的加强，各种信息传播媒体如电视机、录放机和藏汉文版的《西藏日报》、《西藏科技报》等报章杂志的出现，使农牧民对外面的信息了解得越来越多。我们惊讶地发现，乃琼乡的一些农民竟对樟木口岸哪些货物的紧缺情况了如指掌。当更多的家庭拥有电视、录相机后，便形成全村老人集中一家一起看藏语片，如象《西游记》、《水浒》、《济公》等翻译成藏语的录相片也倍受老人喜欢；年轻妇女们则到另一家去看言情、论理片；小伙子们更喜欢看武侠、打斗片。此外，近年来甜茶馆逐渐成为农村人活动的中心。这里既有年轻人，又有老年人；既有男人，又有妇女（几年前，女子进甜茶馆还会被人取笑）。人们既来这里休息、谈情说爱，又在这里洽谈生意、交流信息。甜茶馆已成为乡村人娱乐、联络之地。

就农牧民与城市居民的联系来看，80 年代，随着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一些人将他们的农村亲友接到城市并帮助他们从事各种买卖活动，这些人一月所得收入一般超过国家干部的工资，他们反过来常常会接济、帮助城市的亲戚。我们曾在拉萨市八廓街调查时，发现许多从农村来的个体户都是靠城市亲戚帮助租房、或投资开铺才跻身于城市个体户行业的，当然，一旦他们立足于城市，又会带来更多农村亲戚。而且他们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也就是说，农牧民的社会关系圈在不断扩展，不但农牧民内部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内部联系更加频繁，而且也加深了与城市居民的关系。

5、商品意识的形成。长期以来藏民的商品意识较为薄弱，但近十多年来，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促使了农牧民商品意识的形成。经常外出干活的农民，不得不雇请他人来帮忙干自己承包地里的农活，或者将自己的承包地暗中出租给他人

(国家政策规定土地不能转让)。不管采取哪种办法,实质上最后都得以商品交换形成实现。另据,堆龙德庆县拥有车辆的农民,一般是通过外出打工等积攒一笔资金,先买一辆旧式东风卡车,雇请一位会开车的司机,每天付给七八元的工钱(包括提供食、宿),然后自己跟车学习,一年后辞退司机,自己驾驶。待赚到更多的钱后,再卖掉旧车买新车,也有一些人,是先去有车家“打工”,帮司机干活,不但一天能挣到四五元钱,还能学习驾驶技术。到技术熟练后再自己买车。不管是买车、换车,还是雇请司机、打工学艺,无不体现出堆县农民臻熟的经商意识。当然,农牧民商品意识的形成,是农村进入商品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

城市化,既改变了农民的衣、食、住、行,给我国藏区乡村输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同时又打破了长期以来藏区农村封闭落后的氛围,彻底结束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状态,出现了农业依赖工业、农村依赖于外界、依赖城市的现象。

四、结论

从峨山和瑞丽来看,发展的道路是不同的。峨山高平乡以烟草种植为主,成了玉溪卷烟厂的腹地,其他的兼种茶叶和山货,粮食只能自给。工矿业比较成功的是开矿和水泥厂,这是本地资源。高平乡虽然交通不便,没有什么工业,但是人少,山地面积大,现在大部分的山地都已绿化,封山育林,林木成材以后将会成为重要的产业支柱。现在人均收入已达 780 元。目前商业的网络已渗透到乡村,每个村都办了学校(初小),乡有中心学校(5~9 年级),教育也普及到山村,教师也都是专科或本科大专院校毕业的。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但一部分靠乡政府支付,以保

证教师的收入不低于县城。

而文明办事处则走的是另一条路,以商贸起步,发展起运输业,很快就完全取代农业,完成了乡村都市化的进程。成功的原因在于回族人的重商主义的文化传统,因而起步早,发展快,率先富裕起来。

峨山县城也是靠商业服务业发展起来以后,生活水平才有了大的提高。现在县里的集市,方圆几百里的人都来赶集,昆明许多单位和公司都来拉运山货,一个山区县城,有 3~5 万人来赶集,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西藏的堆龙德庆,发展的道路颇为复杂。八十年代在发展小城镇、发展乡镇工业的政策指引下,与内地联合办了村、镇、县等企业,但由于堆龙县既无工业原料,又缺能源,同时又缺管理和技术人才,所以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倒闭,银行的贷款亦无法收回。最后选择的依靠自身资源来发展的道路。其资源一是农业,就是把单一的粮食种植改为多种经营,包括种植蔬菜等。第二个资源就是濒临首府拉萨。拉萨旅游业兴起后,服务业发展很快,大规模的基本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堆龙人就输出劳动力,从事建筑业和服务业,虽然大部分人是兼业型,即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做工,但劳务输出已成为收入的重要部分。第三个资源就是地处交通要道,拉萨通往尼泊尔的国防公路从县内经过,因此就发展起交通运输业,包括客运和货运。尽管非农业劳动力才仅占 18%(没有统计兼业者),镇的城市人口占的比重还不是很多,但商业的思想已深入到藏人的脑中。

两个民族省区的发展一致的地方,就是都市化的进程与汉化的进程是同一的。从语言上看,过去政府强行推广汉语,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要做生意就必须与汉人打交道,

就只有学习汉语。堆龙德庆人现在许多人都是通过电视来学习汉语，汉语的普及这在云南和西藏是一致的。从生活方式的转变来看，衣、食都在转变，除了傣族还保持本民族服装（主要是妇女），而彝族和藏族的服饰逐渐汉化，饮食结构，尤其是餐馆中的服务方式汉化程度更高。三从经济结构来看，经济结构的转化，无论是农业还是服务业，农产品的商品化，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经济联系愈来愈紧密。从观念意识来看，也发生了变化，如一些藏人觉得穿藏装工作起来不方便，就是一例。但云南的瑞丽，除了语言上的汉化以外，其他方面还保持着强烈的民族风格，无论是建筑设计，还是餐饮服务业都保持着傣族的风格，因为瑞丽人认为民族的风格和民族的文化是吸引旅游者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另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这几个地方都保持着强烈的宗教信仰。文明办事处的回族人信伊斯兰教，彝族人信民间信仰，瑞丽人信奉小乘佛教，堆龙人信奉藏传佛教。宗教生活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成为保持民族认

同的重要因素。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今天，宗教节日和宗教建筑又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资源。

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走的是不同的乡村都市化之路，沿海是以乡镇企业起步，带动起第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乡村工业在沿海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民族地区，都有过办工业失败的教训。笔者认为道路的选择不同是因为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不同。沿海地区自然资源缺乏，人口密度大，因此就业的压力比民族地区大，同时沿海有比较好的商业传统和工业基础，选择工业来发展实践已证明是正确的。而民族地区人多地广，资源比较丰富，既有自然资源，又有旅游资源，就业的压力不大，又缺乏办工业的基础，实际上办工业很可能导致对旅游资源的破坏。从民族地区的发展来看，乡村都市化并不一定需要乡村工业来起动力，商业贸易和旅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并不亚于工业。相比之下，在沿海，由于片面强调办工业，把一些原有的旅游资源破坏。因此，因地制宜地选择自己的发展之路才是上策。

· 书讯 ·

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马戎教授主编的《西方民族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做为该研究所主编的《社会学人类学译丛》之一，即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上半年出版，全书约35万字。

该书是马戎教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民族社会学”研究生课程的主要参考书，包括了西方在研究民族关系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经典案例等方面的22篇文章，这些篇章分别选自有关专著和专业杂志，代表了西方社会学在民族关系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们已完成了翻译与初校，现已进入最后总校对的阶段。



【方法与方法论】

关于“分离指数”的计算方法

马 戎

“分离指数” (Index of Dissimilarity) 是一种计算全体结构与内部各部分结构之间差异的量化指标。被应用于这种计算的结构, 可以是人口的年龄结构、教育结构、性别结构、职业结构、收入结构, 也可以用于计算民族结构。“全体”与“部分”, 也可以使用各种划定的方法和单位, 可以按照居住格局来把一个城市整体居民的结构与它的各个街区 (街道办事处、居委会) 居民的有关结构相比较, 可以把一个农业县 (或它的农牧业人口) 的结构与下属各村落 (行政村、自然村) 人口的结构相比较, 也可以把一个大企业整体职工队伍的结构与下属各部门、工厂的职工结构相比较, 以考察整体与部分之间在结构方面的差异。作为一个计算得出的量化指标, 这个差异的“度”是准确的和可以进行横向比较的。

在美国有关种族、民族关系的研究中, “分离指数”经常被用于分析居住方面的种族隔离程度, 即一个城市人口的种族比例与各街区人口的种族比例的差别。

“分离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ID = 1/2 \sum_{i=1}^n \left| a_i / A - b_i / B \right|$$

ID: “分离指数”; n: 表示各街区 (计算单元) 总数;

Σ : 表示从 $i=1$ 至 $i=n$ 所有街区 (计算单元) 的连加;

a_i : 表示在第 i 街区中 A 民族人口数; A: 全城 A 民族人口总数;

b_i : 表示在第 i 街区中 B 民族人口数; B: 全城 B 民族人口总数。

例如, 在一个城市中 A 民族人口总数是 10 万, B 民族人口总数是 20 万, 如以街区为计算单元, 全城在行政上划分为 6 个街区, 各街区的民族人口依次为:

第 1 街区: A 族 1 万, B 族 4 万; 第 2 街区: A 族 2 万, B 族 3 万;

第 3 街区: A 族 0.5 万, B 族 4.5 万; 第 4 街区: A 族 4 万, B 族 1 万;

第 5 街区: A 族 1.5 万, B 族 3.5 万; 第 6 街区: A 族 1 万, B 族 4 万。

计算方法:

$$ID = 1/2 \left\{ \left| 1/10 - 4/20 \right| + \left| 2/10 - 3/20 \right| + \left| 0.5/10 - 4.5/20 \right| + \left| 4/10 - 1/20 \right| \right\}$$

$$\left| + \left| 1.5/10 - 3.5/20 \right| + \left| 1/10 - 4/20 \right| \right\} = 1/2 \{ 0.1 + 0.5 + 0.175 + 0.35 + 0.325 + 0.1 \} = 1.55 \div 2 = 0.775$$

计算结果，这个城市的民族居住格局的“分离指数”为 0.775，或以百分数计为 77.5。这也就是说，如果需要使 6 个街区中的每 1 个街区人口的民族比例都达到 1 比 2（A 民族为 1/3，B 民族为 2/3），A 民族和 B 民族人口中需要在街区之间迁移的两个百分比之和为 77.5%。

【书评】

认知、态度与行为

评《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

怎样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民族关系问题以弥补国内民族志研究的不足，这是民族社会学首先需要考察的。马戎老师在对国外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做了大量的比较、剖析和反思之后，指出按种族或民族来划分群体，同从性别、年龄、职业、户口（如中国的“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维度来划分一样，是社会组织的一个内容。因而社会学研究不同群体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推广运用于种族或民族的研究中，而对种族或民族的社会学研究则可丰富社会学对其它类型群体研究的方法技术。这种观点在我读吴泽霖先生写于 1927 年的博士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时，感受尤深。吴先生的研究极具社会学味道，本人试就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进行分析。

吴先生反对把“态度”定义为“趋向”、“一般定向”、“被压制的活动”，因为这些都是为社会学调查技术所达不到的，因而也不是社会学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态度只能以“一系列明确的、系统的公共活动来说明”。是故，吴先生认为种族态度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不同种族成员所反应的一系列连贯的、观察得到的公开的活动”。此外，吴先生还对“黑人”、“犹太人”、“东方人”这些主要名词给以明确的界定。从这些界定可以看出，吴先生的研究还是深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他从社会学调查技术的角度出发，对概念进行操作化归纳，使之变为可观察和可测度

的。

吴先生这部著作中很浓的社会学味道，还体现在他对社会现象的研究绝不仅仅从某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从官方在某些“自由”、“平等”等旗号下所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出发去构建所谓的种族或民族关系图，而是始终注意到官方的态度与实际社会之间存在着深刻而重大的差异。并注意从实际的民众生活情况出发来研究。比如美国的法律规定公民是平等的，这是一种国家的立场，但这是否就意味着美国是一个实现了种族平等的社会呢？政府官员在执行法律、法规时是否也能保证做到对各种族和民族一视同仁呢？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官方的正式态度及官僚体制的惯习对于种族或民族关系至为重要，这两者为该国家的种族或民族关系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格局。也正因此，吴先生无论是在研究黑人、犹太人或是东方人时，首先关注他们在公民权方面，在政治领域内，在司法领域，在教育领域这些与国家权力运作联系非常紧密的空间里所受到的实际待遇，并且发现了大量的规避和各种形式的平等。

一个种族或民族的群体要在一个社会里扎下根来，最重要的是要在该社会的经济结构（职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经济空间都是对每个人、每个群体开放的。种族或民族群体在经济空间中所分配的位置实际上是种族或民族群体之间斗争与妥协的产物，因而从一个种族或民族在经济结构中

所处的位置便能看出该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是否进入了该社会结构的中心，或处于优势地位，或是被阻挡（或排斥）在社会结构的边缘上，处于劣势地位。吴先生在该论文中简略但很清晰地描述了黑人、犹太人及东方人在经济领域内的职业分布状况，求职、工资、晋升、管理等方面受到的种种不平等待遇。

如果说种族或民族群体在政治、公民权、司法、教育等等与国家管理权力紧密相联的领域所受的歧视状况反映的是在表面上（或事实上）在公共领域内的地位以及被官方认可的程度，在经济领域内所受的待遇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实际地位，那么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如在经常性一般场景中（剧院、电车、舞场、餐馆、理发馆、旅馆、公共休息室），尤其是日常的社会交往中（如邻里交往中）的状况则最能体现出种族或民族群体一般成员互相之间所持的态度，因为这些行为大都是惯常性的，最“社会化”的，因而也是最根深蒂固的和最强有力的。如果说群体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受到的歧视还能得到官方的干预与制约的话，在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在邻里关系与社会交往这些“私人事务”上，官方的力量则鞭长莫及。吴先生用“社交距离”这个概念来说明和测度不同种族或民族成员之间的社会接触，他指出即便是某一群体的个别成员受到了另一群体个别成员的尊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进入这些成员中的私人小圈子，被真正当作他们中的一员来看待。

吴先生在研究了种族（或民族）态度的表现后，又从经济利害关系上和心理上对其根源进行分析。他认为种族态度在多数情况下与其说是“身份的”，到不如说是“经济性的”。许多利害关系的改变往往可以导致种族态度的改变。吴先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认为存在着优势群体的统治精神变态和劣势群体的被统治精神变态。

吴先生的研究虽然距今近七十年，但其研

究的思路和方法对于我们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如把“城市人”看作城市社区的一个优势群体，而城市里的“乡下人”——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便可发现它们二者虽然同处一个城市，但在各种官方领域、经济领域、社会生活领域里，后者实际上是做为一个群体受到了优势群体的歧视。他们被视为脏的、不卫生的、言语粗俗、不讲文明，贪钱占便宜，不负责任，也不可信任的人。“城里人”将城市的街道不洁、治安混乱、交通拥挤一股脑地推给了弱势群体。在社会交往上，“城里人”对农民工始终保持着高高的距离。虽然“城里人”与“乡下人”都属同一个民族、种族，但实际上所出现的情况却是极为类似的。所不同的是这些农民工群体的少数或他们的后代的少数则可能会通过其它渠道（如暴发或升学）而变成城市人群体的成员，这在种族或民族群体中是不可能的。

社会群体的划分、区别做为社会组织的必要要素，在任何社会里都是普遍的。这种划分的过程实质上是权力运作的基础、过程和结果。如果从这一维度重新考察种族群体及其它类型的群体，可使我们获得新的启发。而这一维度在吴先生的著作中处于隐蔽的状态，他虽然意识到种族或民族的态度来源于群体之间的交互认知（如对方群体是否会威胁到己方群体的生存），以及优势群体为维持自己的地位的权力运作。但是这一维度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认知——态度（带有感情取向行为）——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再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吴先生也没有考察大量的个案中的认知——态度（带有感情取向行为）——权力三者的关系，也没有挖掘出种族或民族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歧视的态度是怎样在无数多的个体以及群体的认知、态度（行为）和行使权力的过程得以再生产的。

法国学者布迪厄使用区隔（distinction）一词来描述社会中的各种分类活动，他认为“界线就是人们全力以赴地攻击或防守的边界，而

确定他们的分类系统，与其说是知识手段，不如说是权力手段，这些手段与各种社会功能相结合，公开或隐蔽地以满足某一群体的利益为

参考书目：吴泽霖，《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

布迪厄理论摘自《国外社会学》1994年第5期，31-32页

目的。”布迪厄的论述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吴先生研究上的某些不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95 硕士生 郭建如）

【调查报告选载】

编者按：1994—199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担了合作研究课题“中国教育的区域发展”，在全国6省24个县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内蒙古、云南、吉林3省的7个民族聚居县。本期刊登吉林省安图县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供各位同行交流参考。

安图县教育发展状况（节选）

于长江

一、概况

安图县位于吉林省东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南部，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安图县境内早在旧石器晚期即有人居住，周代以后，秦、汉、隋、唐、辽、金、元历朝，该地均归属一定的行政机构管辖。明代，这里土著居民为女真-满族，南部长白山是满族传说中始祖“布库里雍顺”的“发祥圣地”，附近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最早建立政权的“赫图阿拉”城。清代，满族统治者为了保护这块“龙兴之地”，于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将兴京以东、伊通州以南、图们江以北疆域实行封禁，县境内人迹渐绝，但仍有零星冒险潜入者。其中有朝鲜贫苦农民，为谋求生存，不顾中、朝两国政府的严厉封禁，冒死越境进入该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后，封禁政策有所松动，朝鲜越境私垦者迅速增加，特别是1860—1870年间，朝鲜北部发生前所未有的水灾、旱灾、虫灾，灾民大量涌入。光绪七年（1881年），清朝为了保疆筹边、增加财政收入，废除了禁令，并设立机构招民垦荒，又有许多朝鲜农民应招迁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兼并朝鲜后，又有一些朝鲜难民、反日人员和失业人口人离开朝鲜，越境进入中国。同时，日本提出所谓“中韩边界问题”，故意误指图们江的源头，把图们江说成另一条河流，进而把图们江以北的中国领土称为朝鲜“间岛地方”，派员管理，并不断扩大其领土要求的范围，甚至把吉林省中部都划归到所谓“西间岛”范围内，借此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清政府为了加强这一带边务，特别是保护图们江国界，开始加强这里的行政管理，并与日本进行了交涉，勘定边界，溯清河流源头，澄清了界河。宣统元年（1909年）组织移民200户到娘娘库（今松江镇），设县治，定县名为“安图”，属奉天省长白府管辖，这是安图县设县之始。

作为一个设置比较晚的县，安图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对较快，据历史记载，清宣统元年（1909年）设县治时，仅有县民364户，1784人，以后人口迅速增长。1994年常住人口为217768人，80多年中增长了122倍。

表1、安图县人口增长情况

年份	户数(户)	人口数(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1909	364	1784	0.17
1911	1138	5271	—
1934	—	16447	2.9
1946	5323	23541	
1953	12790	53674	7.2
1964	22153	105720	14
1982	41872	185256	24.9
1985	46050	194442	26.1
1990			
1991			
1992			
1993	59957	216777	
1994	61111	217768	

资料来源：《安图县志》，《安图县统计年鉴》

1994年总人口，按照中国的“户口”制度的划分，属于“农业户口”的人口为112826人，占人口总数的51.8%。如果以居住地域划分，乡村人口数为104833人，占总人数的48.2%，少于具有“农业户口”的人数。

安图县人口中有汉族、朝鲜族、满族、回族、蒙古族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民族的人数比例有所不同。

在设县治不久的宣统三年（1911年），全县人口5271人，其中朝鲜族806人，占总人口的15.3%。1934年，全县有朝鲜族3058人，占总人口的18.6%。到1949年，朝鲜族人口增至26654人，占总人口的51.7%，超过了汉族人口。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汉族人口为20793，占总人口的38.74%；朝鲜族人口31721人，占总人口的59.1%，满族占总人口的1.89%，回族占0.24%。到1964年第2次人口普查时，汉族人数增至54939人，占总人口51.97%，朝鲜族49415人，占总人口46.74%，其余为满族等。1982年第3次人口普查时，汉族人口130560人，占70.43%，朝鲜族51739人，占27.93%，其余为满族、回族、蒙古族等。

1982年以后，有一些原来填报“汉族”的人改报“满族”，但汉族人口仍占优势。1990年后各民族人数比例如下：

表2、1990—1994年各民族人口比例

年份	单位：%				
	汉族	朝鲜族	满族	回族	其他民族
1990	72.2	25.3	2.3	0.2	0.1
1991	72.5	24.9	2.3	0.2	0.1
1992	72.8	24.5	2.4	0.2	0.1
1993	73.2	24.0	2.5	0.2	0.1
1994	73.5	23.8	2.4	0.2	0.1

资料来源：《安图县统计年鉴》

二、教育发展的历史

1、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教育

安图县由于建县治时间较晚，教育事业起步较晚。据现有资料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由地方绅士多人共同倡导，创办瓮石砬子学堂，这是本地最早的教育机构。当时租用民房9间，

学生 89 人，设一班，分甲乙两级。

宣统三年（1911 年），安图县政府在娘娘库（今松江镇）创办“安图县学堂”，有讲堂、宿舍、教习堂、厨房、夫役室等 7 间校舍，招收学生 160 余人。

据现有记载，最早的私塾教育略迟于学堂的出现，由朝鲜族人士创办。中华民国 5 年（1916 年），崇礼乡（“崇礼” chongli 意为“崇尚礼教”）朝鲜族梁某创办本县境内第一所私塾，塾师也是朝鲜族人，学童 24 人，每人每年学费 3 元（日元）。同年，这个乡又开办“改良私塾”，朝鲜族人金某担任塾师，学童 43 人，塾师年收入 100 吊。民国 17 年开始有汉族人开办的私塾，1934 年后，先后创办了 8 所私塾，直到 1949 年后陆续停办。

小学教育：安图县小学教育始于 1911 年建立的“第一小学校”，后又陆续建立 3 所小学。到 1930 年，全县有小学 11 所，教员 18 名。明月沟一带有延吉县立第九、底二十九、第三十小学和倒木沟小学，还有私立小学 3 所，基督教会小学 11 所。1944 年“光复”前，全县有国民学校 32 所，国民优级学校 9 所，其中有些学校的校长、教导员均为日本人。

中学教育：民国 17 年（1923 年），由地方乡绅提倡，政府支持，于县城（今松江）创立“奉天省安图县公立初级中学”，教师 2 人，学生 30 名，办学经费由公署公款处开支。民国 19 年（1930 年），第一届学生毕业 23 名，学校因经费拮据，师资缺乏停办。

除中小学教育外，1934 年，基督教会曾在明月沟办过朝鲜族幼儿园（当时称“幼稚园”）。

2、“光复”以后的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 年日本投降，在经过了短期过度性临时政府之后，1946 年，共产党军队直接接管安图县，并建立政权，所以，最后“解放”的年代被认为是 1946 年，而不是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 1949 年。

从 1946 年起，政府发动群众办学，至 1949 年，全县有公立和民办小学 22 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政府对小学进行了调整，教学水平低的教师被要求改行转业或被送去进修，学生进行统一考试，调整班级，合班并校，1952 年共有小学 38 所，1955 年统计，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84.2%，其中朝鲜族儿童入学率达到 98.5%。1958 年，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教育部门提出公办、民办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安图县提出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将失学多年的超龄学生动员回校，学生增加，班级超员，师资水平低，教学质量下降。1964 年，为了普及小学教育，根据县境内某些地区偏僻多山的特点，开办巡回教学点，使全县儿童入学率达到 96.32%。

1945 年 10 月，明月沟群众自筹资金兴办“私立东明中学”和“私立明成女子中学”，同年，两校合并，更名为“私立东城中学”，1946 年，石门区小学增设朝鲜族初中班，1947 年成立“新民中学”招收汉族学生，同年因学生大量参军参政，学校改为初中补习班。1948 年，在县城松江成立“安图县立初级中学”，招收汉族和朝鲜族学生，1949 年，该中学随县政府一并迁往明月沟，与私立东城中学合并，定名为“安图县立初级中学”1953 年成立汉族分校，1954 年汉族分校改为“安图县第一初级中学”，原县立初中改为“安图县第二初级中学”，同时，在 4 个乡镇小学附设初中班，1958 年，安图县第一、二中学增设高中班，万宝小学附设初中班改为万宝中学，同时成立松江中学，至此，安图县教育格局基本形成。

3、“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的指导思想发生变化，“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贫下中农毛泽

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城镇和乡村学校，领导学校的工作。教员与贫下中农社员进行“对流”，社员到学校任教，教师到社队劳动，同时对中小学进行多次“分”与“合”的调整，小学数量增加到 176 所，在校生 25369 人。教学方法上削弱课堂教学和课本知识，强调通过社会实践学习知识，强调阶级斗争和政治思想教育，即所谓“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大课堂（社会）与小课堂（教室）相结合”等原则，比较极端的情况有鼓励“造反有理”、“反潮流”，反对“师道尊严”、“智育第一”等活动。

4、1976 年以后的教育

“文革”结束后，学校教育经过了一个所谓“拨乱反正”的时期，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秩序得到了恢复，统一了课程设置和教材，恢复了文革前的学制，但由于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教学管理和内容不可能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而要适应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社会背景。针对当时学生基础知识较差的状况，学校在教学内容上强调“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针对长期封闭造成的教学方法、设备陈旧落后的问题，各学校注重购买或自制了幻灯机等“现代化”教具，并引进许多新式教学法。

文革后，政府开始所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县政府成立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经过几年努力，将在 1957 年“反右斗争”中“错划”的 38 名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并安排工作，平反了“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 86 件，受株连者也得到安置。同时，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中安排了教师代表，以示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

政府几次提高教师工资，教师进修学校举办各种脱产学习班，民办教师大部分转为公办教师或代课教师。

这一时期教育工作最主要的一项发展，是高考制度的恢复。由于这种决定许多人终身命运的考试制度在遭到破坏之后有重新开始运行，人们出于一种对文革中无序状态的反弹，开始狂热地追求高考，形成了持续几年的“大学热”，这一时期正是教育事业恢复发展的时期，所以“文革”后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受到高考导向的严重影响，造成了以应接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和以“拿文凭”为目的的“文凭教育”，这些倾向愈演愈烈，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走上歧途。到 80 年代后期，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除少数尖子学生之外，人们（尤其是农村人口）接受应试教育的热情普遍下降，但已经形成的教育体制和内容设计仍以应试教育为指导思想，这种教育与现实需要脱节的现象，是造成人们受教育动机缺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凭教育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各种部门专业学校的恢复和兴起。这项发展本来的目的在于补普通教育发展之不足，但以此为名义，很快演化为各部门各系统为自己的干部获取文凭、为自己子女安排工作的一条捷径，因而这些教育形式急剧膨胀，以至于出现与后来正规职业教育争生源、争资金等问题。在 1976—1985 年间，先后出现各类学校 10 所。

表 4 非普通教育学校

学校名称	创办或恢复时间	当时学生数(人)	备注
安图县农业高中	1983 年	23	恢复
安图县卫生学校	1970 年		恢复，1982 年迁入明月镇
安图县农业机械化学校	1978 年	80	3—5 期/年
安图县粮食职工学校	1981 年		
吉林省林业技术学校白河分校	1983 年	104	校址在二道镇
吉林省广播电视大学安图县管理站	1982 年	13	无固定校舍
农民夜校（37 所）	1978 年	1300	恢复

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安图县分校	1981年	225	
职工业余教育学校	1981年		恢复
安图县业余体育学校	1971年		恢复

资料来源：《安图县志》

文革结束后，政治思想教育仍然是教学内容的重要部分，先后进行过“批判‘四人帮’”、“抓纲治国”、“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三热爱”、“反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政治教育活动。但这一时期的政治教育，主要以政治课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的形式为主，越来越多地与个人修养、品德教育结合起来，渐渐远离原来意义的纯粹的政治思想教育。“文革”结束至今，学校内没有进行大规模政治运动，没有出现政治教育运动冲击教学工作的情况。

三、教育发展的现状

目前，按照教育部门统计报表和衡量指标，安图县在延边地区居于中等偏上的水平。1994年，安图县小学入学率为100%（高于延边地区平均数99.58%。），巩固率为99.95%，毕业率为99.9%；初中入学率97.8%，巩固率97.58%，毕业率99%。

安图县已于1994年通过了国家“普九”（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验收检查，这样，至少在名义上，安图县已经普及了初中教育。

安图县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保持朝鲜族自身的文化传统，根据有关法律，朝鲜族学生必须进入“专设朝鲜族学校”或“民族联合学校”中的朝鲜族班，接受朝鲜语言文字教育，目前，全县共有朝鲜族小学和民族联合小学19所，具体情况如下：

表 6、朝鲜族小学情况

学校类别	学校数	教学点数	班级数	在校生数	毕业生数	招生数
总计						
专设朝小	5	1	60	2373	329	407
民族联校	14	6	107	2341	304	409
教育办						
专设朝小	5	1	60	2373	329	407
民族联校	12	6	95	1980	253	346

资料来源：《安图县教育统计年鉴》

初中中“专设朝鲜族初中”和“民族联合初中”的情况如下：

表 7、朝鲜族初中情况

学校类型	学校数	班级数	在校学生数	毕业生数	招生数
总数					
专设朝中	2	21	987	272	352
民族联校	6	25	730	198	257
教育办					
专设朝中	2	21	987	272	352
民族联校	5	22	628	168	226

资料来源：《安图县教育统计年鉴》

专设朝鲜族中学都是由教育部门主办的，6所民族联校中有5所是教育部门主办，县境内非教育部门主办的初中以汉族初中为主。

六、地理、历史对教育的影响

1、地理位置与旅游业

安图县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南部，其南部长白山地区为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的边界，每年都有大量来自中国国内和其它国家的旅游者，外国游客中来自韩国的游客特别多，由于旅游活动，本县某些靠近旅游线路的地区，服务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也形成了一定的就业需求。

但是，这里的旅游业没有刺激起各种跟旅游有关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其原因在于旅游业没有提高人员素质的要求。具体而言，其一，国内自费游客通常只希望“到过长白山”，照几张照片回去，他们不特别要求旅游服务的规范性和多样性，而只关注价格是否便宜，因此对旅游业没有提高服务质量的要求；其二，国内大量公费游客多为基层干部，以大吃大喝或打麻将等为主要娱乐方式，他们本身就不需要现代意义的各种服务规范和形式；其三，外国游客主要是韩国人，他们来这里，主要是由于长白山在其民间文化传说中有一定地位，同时这里有大量朝鲜族人口聚居，形成民族认同感，因此他们对服务质量并不做过高要求，服务好坏不影响他们的旅游热情；其四，旅游业内部导游、餐饮、住宿等服务人员互相建立了私人关系，互相负责安排客人，不能形成行业内部的竞争，人们不是通过提高服务质量，而是通过给回扣、建立私人关系等手段来保证客源。

由于这些原因，长期以来长白山地区的旅游服务一直停留在相对初级的水平上，服务质量差、服务项目少，仅仅使当地人赚到一些现钱，而没有造成提高服务人员素质的压力，也就不能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安图县的职业教育中，旅游业始终不是重点，这与本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很不相称。

旅游业使得当地人能够比较多地接触到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这有助于开阔人们的眼界，提高人们的进取心。同时，旅游者的生活方式也对当地青年产生很大影响，促进中学生的分化，有些人更加努力学习，希望将来通过考学，步入社会上层，享受现代生活方式，另一些人放弃学业，急于早一些进入社会“干一番事业”，同样达到享受现代生活的目的。

大量韩国人的出现，提高了本地朝鲜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朝鲜族人接受全面汉语文教育的愿望。

安图县县城几次迁移，造成了明月镇和松江镇2个中心镇，如果再加上交通、旅游和林业的中心二道镇，共有3个人口聚居中心。这种格局，使得安图县比其它的县（如汪清县）人口分布更为均平，地区间的教育发展程度和人口素质差别较小，有利于总体水平的提高。

2、特殊历史环境的影响

（1）历史起源于移民社会，文化基础薄弱。

安图县建制较晚，以前人口稀少，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基础。后来大量移民涌入，人口逐步增加，但这些移民大多为文化水准较低的劳动阶层，建县治后，官方和当地乡绅推动了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但随即陷入长期的社会动荡之中，社会经济得不到发展，发展教育的基础和条

件一直不太好。

(2) 各种势力角逐，各方面都努力发展教育，“争夺青少年”。

安图县在历史上一直是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地方。清末设县治就是为了抵御日本势力的渗透。后来许多朝鲜反日人士到此，以兴办学校的方式宣传反日思想，结交同志者，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支持，这些人从事教育工作非常努力，大大推动了本地朝鲜族教育的发展。在伪“满洲国”时期，反日反满志士仍然在此活动，并组织了强有力的武装斗争。“满洲国”政府试图通过教育大肆灌输传统文化，特别是忠君、孝悌等传统观念，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又不得不听从日本政府的旨意，聘请日本人担当学校领导和教师，在教育内容中大量加入“日满一心一德”等宣传，并大量开设日语、日本历史等课程，极力培养学生的亲日倾向，这种教育，基本上是一种“传统--半殖民地”式的奴化教育，但“满”、日政府为了加强教育效果，也必须引进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客观上也有助于教育工作的规范化，提高了古文、日语等基础学科的教学水平。

(3) 位于边境地区，政治教育气氛浓。

共产党力量接管政权后，这里不再存在多种政治力量角逐的局面，但这里一直是政治、军事斗争的前沿地区。在 1946-1949 年的内战中，共产党在这里进行了有效的战争动员，招兵 847 人，另组建民兵、自卫队等武装 7 千多人以及更多的支前人员。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朝鲜战争）时期，又有 810 人参军。现在，在安图县可以看到不少参战阵亡者的“烈士碑”。在这种强烈的政治军事气氛下，教育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动员群众”工作，1953 年后，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其影响却很深远。现在担任各部门负责人的人，大多出生于 50 年代，在 50-60 年代接受基础教育，当时的政治气氛使这一代人具有某些特殊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素质，如偏重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习惯于以简单的“两分法”（“是”“非”、“善”“恶”）来思考问题，无法接受和宽容现代人文思想，等等，这些特征，会体现在他们关于教育的具体决策中。

(4) 多民族杂居，有潜在竞争和保持体面心理，促使家长重视子女教育。

居住在安图县的汉、朝鲜、满等民族，总体发展水平基本相同，历史上都是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民族，都有强烈的家族观念，注重保持体面和面子，重视子女教育，以教育为正统出路，这些传统，促使人们只要有条件，就要“供”（gong 读如阴平声“工”，意为“努力地以财力物力支持”）子女上学，上学成为保持家庭或家族体面的重要内容。对于不同民族来说，又有一层民族自尊心的影响。不同民族的人在受教育程度、个人素质、成就等方面存在着潜在的竞争心态，谁都不甘居人后，尤其是朝鲜族人，特别不愿在教育方面落后于其它民族。朝鲜族家长们不仅努力“供”子女上学，而且很注意保持子女在学校中的形象，包括举止、穿着打扮等方面，都尽量保持体面。这种动机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

(5) 外来强大压力，无力左右自己命运，听天由命心态，依靠上级。

安图县人经常称自己的县是“经济还不十分发达的农业小县”（引自政府文件），这种称呼，固然有要求上级增加支持的意图，也确实反映了安图县人对自己地方总体发展水平的定位。笔者认为，安图县人口素质其实没有当地人描述的那么低，如果做事态度认真一些，有许多事可以做得更好，但这里民众和干部普遍缺少必要的自信心，凡事总是希望上级或外人来帮助。历史上，这里的民众都来自移民，乡土观念相对淡薄，没有某些古老农业社区“世代代生息繁衍”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一直受到强大外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力量的左右，始终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势力”，加之民族杂居，难以形成以地缘为基础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自信心，人们并不执着地坚持发展本地地方经济，而是倾向于通过各种捷径，如移居其他地区，以求自身

或自己家庭状况的改善。大量朝鲜族人移居其它地区就是一例。这种心态，影响当地的各项发展，包括教育的改进和发展。

七、民族状况对教育的影响

安图县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人口有 73.5%为汉族，23.8%为朝鲜族，其余为满、蒙等民族。从绝对人数上讲，朝鲜族并不占多数，但根据国家现行法律，凡确定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必须实行一系列特殊的“民族政策”，政府方面，行政首脑必须由朝鲜族人担任，政府机关中朝鲜族干部人数比例必须保持在 50%以上；教育方面，必须建立朝鲜族的中学和小学，朝鲜族子女必须入朝鲜中小学，学习朝鲜族语言文字和朝鲜文教材，教育部门中朝鲜族教职工和干部要占半数以上比例，等等。这些规定本来是为了保护朝鲜族的平等权利，保护朝鲜族的文化传统，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有些规定变成了某种障碍。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朝鲜族中小學生源不足。

农村人口比例变化，导致朝鲜族儿童数量减少，农村小学生源濒于枯竭。近年来，安图县农村朝鲜族人口利用亲属、朋友关系，大量离开农村，向延吉等朝鲜族聚居的城市地区迁移，因此农村朝鲜族人口急剧下降。由于这种移民属于完全自发移动，没有任何官方统计，所以没有确切数字。至于迁移的原因，根据笔者访谈，人们（包括朝鲜族和汉族）称农村朝鲜族人口生活平均水平“略低于”汉族人口，因此不愿意在农村呆下去，急于迁移到城市中。村民们认为，与汉族人相比，朝鲜族日常生活缺少计划性，不愿意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纯生产性活动中，而花在娱乐、交往的时间比较长。笔者认为，这种状况与朝鲜族文化传统有一定关系，也反映了朝鲜族人注重精神满足的性格特点，事实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如果综合考察精神和物质生活两个方面，农村朝鲜族的生活质量并不低于汉族农民。汉族农民把大量精力投入物质生产，精神、娱乐生活相对单调，综合生活质量不一定高。但是，由于物质生活水平更具可比性，容易被人们注意到，所以才有朝鲜族生活水平略低的印象。

在朝鲜族大量移民的同时，朝鲜族生育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使得儿童数和适龄儿童数下降。根据官方统计，朝鲜族在计划生育方面一直是所谓“先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朝鲜族法定结婚年龄低于汉族，同时，一对朝鲜族夫妇可以生育 2 个子女（一对汉族夫妇只能生育 1 个子女），但事实上，朝鲜族并不利用这一“优惠”政策早婚和多生子女，朝鲜族的实际生育情况与汉族相差无几。

表 8、安图县人口生育情况

	合计	城镇	农村	朝鲜族
计划生育率	98.6	99.2	96.3	100.0
一胎率	95.0	96.2	91.7	90.1
多胎率	0.06	0.08	-	-
节育率	95.6	95.7	95.3	94.7
独生子女率	64.3	71.3	26.6	45.2
晚婚率	71.6	79.6	52.4	77.8
晚育率	61.1	63.2	53.5	58.2

资料来源：《安图县统计年鉴》

朝鲜族独生子女率达 45.2%，晚婚率为 77.8%，晚育率为 58.2%，这使得近年来朝鲜族儿童数不断减少。每年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数也呈递减趋势。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朝鲜族人口绝对数都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由于移民和子女数减少的影响，朝鲜族适龄儿童数量减少，造成城乡朝鲜族中小学和民族联校中的朝族班生源不足。在农村，有的村每年只有 1—2 名朝鲜族适龄儿童，有的村已不能保持每年都有适龄儿童，因此，有些村小或民族联校中的朝鲜族班已改为隔年招生，但每班仍不超过 10 人，但是不管学生多少，都要配备同样多的朝鲜族教师，因为这些教师大多为公办教师，有固定的编制和工资定额，不能随便变动，因此，有些村小已形成朝鲜族教师多于学生的情况，有些朝鲜族教师改做其它工作，或任其它课程。在城镇，朝鲜族生源也日趋不足，朝鲜小学的班数和班额不断减少，学校实际规模在缩小，教师比例偏高，学校经费相应地减少。小学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初中，小学毕业生减少，初中生源自然减少，由此一直延伸到高中。由于人们对朝鲜族学校热情下降，各种支持也相应下降，朝鲜族学校在经费方面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总体心态比较消极。

在朝鲜族学校生源减少的同时，有些朝鲜族家长不愿意让子女进朝鲜族学校学习，而设法通过“关系”把子女送进汉族学校，他们认为，子女上朝鲜族学校，将来汉语水平低，找工作困难，不容易发展，不如从小上汉族学校，将来顺利进入社会，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据当地的朝鲜族人说，有这种想法的父母越来越多，甚至已经占有朝鲜族的大部分，这部分人主动愿意让自己子女接受汉语文，但他们并不是希望子女“汉化”。首先，他们把汉语视为社会通用语，不仅仅是“汉族的语言”，所以学习汉语文并不是变成汉族；其次，他们认为“朝鲜文化”就是朝鲜语，朝鲜族学生在学校学习汉语文，但在家中，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说朝鲜语，所以不会丢掉朝鲜文化，而是两全其美。事实上，在汉族中小学上学的朝鲜族学生，民族意识仍然很强，但表现得更为理性。

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朝鲜族人主张继续发展朝鲜族教育，并坚决把子女送入朝鲜族学校，由于没有确切的调查，目前尚不能确定究竟支持哪一种意见的人比较多。

不管怎样，大量朝鲜族人的这种接受汉语文教育的要求，使原来的有关政策法规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境：原来决策者主要防止的是“大汉族主义”、破坏朝鲜族语言文字，为了避免这类指责，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强调尊重朝鲜族文化，保留朝鲜族语言文字，保护朝鲜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等等，所以才规定朝鲜族子女一律上朝鲜族学校，可是现在，情况反过来了，政府要求朝鲜族子女入朝鲜族学校，有些朝鲜族人自己反而希望进汉族学校，于是在政府内部引起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应该取消朝鲜族学校，所有儿童都接受汉语文教育；有人认为应该尽力维持朝鲜族教育，设法动员吸引朝鲜族儿童入学；有人认为应该任其自然，由学生和家長自由选择上什么学校。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最坚决主张维持民族教育的人恰恰是汉族干部，除了一般意义的民族平等意识之外，也可能有心理方面的原因。汉族干部特别不愿意被指责为“大汉族主义”，所以特别支持朝鲜族教育的，这样在政治上更稳健。

对于“任其自然”的观点，县乡政府部门中有不少人反对，这些人从政策角度考虑，认为放任自流等于否定了国家“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的基本政策取向，可能会引起“指导思想的混乱”，为那些反对发展民族教育的人提供借口，否定必要的民族教育，甚至有可能破坏民族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担心是完全有理由的。由于中国行政官僚机构特有的素质和机制，下级干部为

了讨好上级，总是有一种盲目赞扬、强化上级某种意图的倾向，所以很多本来温和的、有条件的政策在执行中往往被推向极端，变成一种无条件的、不顾实际情况的命令或社会势力。“发展民族教育”做为一项基本方针，不能有丝毫动摇的余地，如果出现某种可能被误解为“该方针可以动摇”的举措，人们就会对这一方针丧失信心，造成一系列有关政策的崩溃。

在朝鲜族人口中，对于保留文化传统问题，也有不同的情况。除了上文中提到的那种“既接受汉语文教育，又保持朝鲜族文化”的想法之外，也有一些人认为，只要个人有前途，无所谓哪一种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极端的观点是，必须无条件地保持朝鲜族文化，宁可牺牲一部分个人的世俗成功。

直到现在，官方政策（严格地说是延边自治州的政策）仍然是朝鲜族儿童必须入朝鲜族学校，因此，那些想把子女送入汉族学校的家长，就必须设法打破这一限制，最常用的办法是通过转学，因为按照规定，跨县转学的学生可以不分民族，直接进入汉族学校，所以有些朝鲜族家长先让子女入朝鲜族学校，再转到其它县某一中学，然后再转回本县，进入一所汉族学校。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个环节要通过一些“关系”，所以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安图县少数民族人口的存在，也从统计意义上影响着县境内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由于朝鲜族学校、民族联校的存在，需要一部分从事朝鲜语教学的教师，因此政府给定的教师编制要多于非朝鲜族学校，因此，相对于同样数量的学生或人口，安图县教师编制总数要多于一般的汉族县，而教师的受教育程度通常又比较高，所以教师越多，从统计上看，人口的平均文化水准也就越高。

通 告

经本人申请，由本会会员介绍，本研究会理事会经研究决定，批准下列申请人为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员（顺序无先后）：

杨国才 云南民族学院	650031	向跃平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和钟华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韦东超 中南民族学院民研所	430074
乔亨瑞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王奎正 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系	430074
张 洁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柏贵喜 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系	430074
赵 群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窦学诚 甘肃农业大学农学系	730070
杨士杰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靳 薇 中央党校民族理论研究室	100091
李立刚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蓝达居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361005
赵 捷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650032	梁茂春 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530022

本学会理事会、秘书处代表全体会员对新会员入会表示诚挚欢迎，希望今后彼此加强联系，互相提携，共同促进我国民族社会学事业的发展。

联系地址：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本期责任编辑：于长江
邮 编：100871